



# 《水经注》蓟县故城位置研究\*

陈喜波

**摘要:**根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前的蓟县故城在北魏蓟城的西侧,唐代文献记载燕国宫殿遗址在唐代幽州城西不超过四里,也说明《水经注》蓟城故城在北魏蓟城以西。考古发现也证实今北京广安门附近出土的早期器物来自古代洪水自西向东的冲刷挟带,为《水经注》蓟县故城位于北魏蓟城以西提供了一定的佐证。金代扩建中都,西城墙向西扩展三里,而在中都城北城垣最西侧有“会城门”,其中“会城”在地名学上是古城遗址的指代,因而提供了北魏蓟城以西有古城遗址的间接证据。地名线索、文献记载和考古结论可相互印证,说明《水经注》蓟县故城在北魏蓟县城即后期蓟城的西侧不远处。据近代测绘地图分析,《水经注》蓟县故城约在会城门村西侧的一片台地附近,此处当为古代的蓟丘,该城约毁于东汉末至曹魏初期的洪水。

**关键词:**《水经注》;蓟县故城;位置;洪水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3-0042-08

今天的北京城最早起源于蓟城,自建城伊始至今已三千多年的历史。西周之初,武王在北京地区分封了两个诸侯国——蓟与燕,《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sup>[1]</sup>后来,燕灭蓟,以蓟为都城。秦汉以后,蓟城长期作为蓟县治所,沿至辽代。由于古代文献记载较少,且内容很简略,关于蓟城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北京历史地理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水经注》记载的蓟县故城与北魏蓟县城不在同一个位置。当代考古工作者在今北京城西南侧的白云观以西发现蓟县故城的西北城角,在城角北城墙北侧正中夯土下叠压有东汉墓葬,由此证实东汉之后的蓟城没有沿用前代蓟城城址。东汉以前的蓟城即郦道元《水经注》所记的蓟县故城,关于该城的位置,已有很多学者研究,至今未有定论。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拟对《水经注》所记之蓟县故城的位置作进一步探索。需要说明的是,当代考

古研究已经确定,《水经注》蓟县故城即是东汉之前的前期蓟城,《水经注》所记北魏蓟县城是自东汉以后的后期蓟城,本文因行文需要会使用前期蓟城和后期蓟城的说法,故于此处说明二者的指代关系。

## 一、前人对《水经注》蓟县故城的研究

蓟城作为北京城市的起源地,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历史考古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主要的研究焦点之一,已经有很多学术成果问世,综合来看,关于前期蓟城位置的学术观点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侯仁之、尹钧科等学者认为,《水经注》蓟县故城在广安门内外。1959年,侯仁之在《文物》杂志发表《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一文,其通过研究《水经注》关于灤水和蓟城的记载,认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至唐,蓟城

收稿日期:2022-11-27

\*基金项目:北京学研究基地开放课题“《水经注》蓟县故城研究”(BJXJD-KT2022-YB10)。

作者简介:陈喜波,男,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101),主要从事运河文化研究。

城址,并无变化。其后辽朝,虽以蓟之故城置为南京,但是并无迁移或改筑。只是到了金朝建为中都之后,才于东西南三面扩大了城址。”<sup>[2]</sup> 1995年,侯仁之撰写《北京建城记》碑文,文中指出“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其中心位置适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该碑竖立在广安门外。尹钧科依据《水经注》中的文献记载,利用1957年广安门发现的战国时代的文化层及燕国宫殿饕餮纹瓦当等考古资料,同时结合对蓟城所在区域的水系和交通因素方面的分析,认为北魏以前的蓟城城址曾经有过变动,但变动不是很大,只是新旧蓟城大部或部分地叠压在一起而已<sup>①</sup>。韩光辉认为前期蓟城沿用商代或周初蓟城旧址,方圆在千米左右,位于宣武门、和平门及白云观东西一线南北两侧,其中西周蓟都小城就位于广安门外护城河一线东西两侧<sup>②</sup>。赵国印也推测蓟城在今天北京广安门以北和白云观之南一带<sup>③</sup>。岳升阳认为战国至西汉蓟城城址范围东至琉璃厂,南至南横街,西至广安门铁路附近,北至白云观北侧;城址东西宽而南北窄,略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或与燕下都相似。汉代以后,蓟城城址面积缩小,但核心部位仍在广安门一带<sup>④</sup>。刘元章在其论文《北京莲花池湖的形成时间探讨》一文中认为《水经注》蓟县故城在莲花池湖地带,北侧为蓟丘<sup>⑤</sup>。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认为《水经注》蓟县故城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1956年,为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文物工作者发现了一百五十余座战国至汉代的瓦井,在宣武门豁口两侧到和平门之间分布最为密集。1965年,文物工作者又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发现瓦井五十余座。此外,在琉璃厂、新华街、象来街、北线阁、广安门内大街、校场口、牛街、姚家井、白纸坊等地,直至西单的大木仓,都发现有瓦井。同时,在瓦井分布密集区以南,永定门火车站、陶然亭、天坛、蒲黄榆、宝华里、定安里一带,发现有数量较多的战国至汉代的小型墓葬。特别是1973年在法源寺附近、1974年在白纸坊以北地图出版社院内发现两处战国墓群,1977年在西单白庙胡同路南商业部后院发现西汉墓。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根据考古发掘情况,提出前期蓟城当在瓦井分布最密集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蓟城

的南城墙可能在法源寺以北,北城墙在西长安街以南,并推测蓟城可能因灤水洪水泛滥而被冲毁,城址于东汉以后西移<sup>⑥</sup>。

长期从事北京历史考古研究的学者赵其昌曾对宣武门至和平门以及周边出土的井圈和墓葬进行了分析,认为《水经注》蓟县故城不应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根据考古发现中井圈上部缺失的事实以及汉代、战国文化层缺失的情况,提出前期蓟城可能受到洪水泛滥的影响而导致地层缺失。他根据沙层中夹杂的陶片棱角磨光现象,推测前期蓟城可能遭到洪水冲击,导致城中的遗物漂流到白云观附近。根据洪水冲毁蓟城的假设,赵其昌对前期蓟城提出三个可能的位置,一在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地区,二在京西南的外城以西地区,三在后期蓟城南。其中第二个可能性较大,第一个次之,第三个最小<sup>⑦</sup>。

关于《水经注》蓟县故城的位置,还有的学者认为在石景山区磨石口、金顶山一带<sup>⑧</sup>;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认为前期蓟城在平谷刘家河附近<sup>⑨</sup>;也有学者对白云观出土战国陶罐上的陶文进行考释,认为白云观遗址附近就是战国燕国上都蓟城之所在<sup>⑩</sup>。

## 二、《水经注》蓟县故城位置分析

### (一) 历史文献记载的《水经注》蓟县故城的位置分析

《水经·灤水》记载:“(灤水)过广阳、蓟县北。”酈道元注云:

灤水又东径广阳县故城北,灤水又东北径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径其北,盖经误证矣。……灤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其水又东入灤水。灤水又东,径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址

盘固。……灤水又东南,高粱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径燕王陵北,又东径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灤水。<sup>[3]216-217</sup>

在这段文字中,酈道元提到了蓟县故城和蓟城,那么二者是否就是一座城呢?如果蓟城就是蓟县故城,说明后期蓟城继承了前期蓟城,那么就不会有蓟县故城遗址的存在,《水经注》也根本没有单独提出“蓟县故城”的必要,直接记录灤水经蓟城南就可以了。根据常征的研究,《水经》成书于东汉延熹元年(158年)至中平六年(189年)之间的31年当中<sup>①</sup>。按照《水经》的记载,东汉末年灤水经流广阳县、蓟县之北,广阳故城在今房山区的广阳城村,蓟县即《水经注》中的蓟县故城。但依据成书于北魏的《魏土地记》记载,当时灤水却流经广阳故城北,蓟县故城和蓟城南,而不经蓟县故城北,故酈道元认为《水经》错误,其实不是《水经》有误,而是灤水改道所致。根据尹钧科的研究,北魏时,广阳县治迁移至今大兴区黄村镇南约二十里处<sup>②</sup>,故《水经注》称原广阳县城为故城。此时,蓟县治所也迁移至后期蓟城处,故前期蓟城在《水经注》中称蓟县故城。北魏时,灤水先流经蓟县故城南,然后流经蓟县城南,灤水继续东流,有洗马沟水流入。洗马沟水来自蓟城西侧大湖,大湖水源自蓟县西北平地,泉水汇流成河,称作蓟水,注入大湖。洗马沟水从大湖流出,沿着蓟县南门向东流过,汇入灤水。从《水经注》以水为纲描述其所经的地理事物的顺序来看,显然蓟县故城在北魏蓟城的西侧,且与蓟城西的大湖关系密切,故而有“盖燕之旧池也”的描述。北魏蓟城即是东汉以后的蓟城。赵其昌认为前期蓟城的地点之一在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地区,即石景山区古城一带,但该位置明显与北魏时灤水的流向不符。因为古城村位于广阳城村正北,灤水经流广阳故城北后,再向东北流,无论如何也无法流向石景山古城附近,因此赵其昌所认为的前期蓟城在古城村一带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同时,按《水经注》描述,蓟县故城在北魏蓟县城之西,因此赵其昌推测其在后期蓟城南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依据以上分析,《水经注》蓟县故城只能位于北魏蓟县城的西侧不远处。那么,新旧蓟城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呢?根据《史记·乐毅传》,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伐齐,攻占齐国都城,将齐国宫室珍宝运到燕国都城,“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曆室”<sup>[4]2431</sup>。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燕元英、曆室二宫,皆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sup>[4]2432</sup>唐代蓟县设在幽州城内,幽州城即东汉以后的蓟城。按《括地志》所说,元英、曆室二宫在蓟县西四里<sup>③</sup>,这两个宫殿在前期蓟城之内,这样看来,前期蓟城距离后期蓟城不会超过四里。

## (二)考古发现所揭示的《水经注》蓟县故城与后期蓟城位置之关系

虽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发现较多的井圈,但赵其昌在考古工作中发现,出土于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的所有井圈都是井的下半部陶圈,即陶井圈并没有出露地表,其最上层与现有地表有一段距离。陶井的分布情况,包括陶井的上部结构、井口设施等都不清楚。并且北京市区内的地下堆积中多为辽金元明时代遗物,汉代、战国时期的文化层很少见。赵其昌认为陶井上部缺失和战国、汉代文化层缺失应是受到洪水冲刷的结果。1974年,赵其昌在发掘白云观西侧遗址时,发现北侧的沙层中间常常夹带一些夹砂红陶碎片,陶片又常常具有棱角磨光的现象。他推测红陶棱角磨光是水的作用造成的,即陶片长期被水冲刷的结果,并且从陶片与流沙混合夹杂的现象分析,认为应是从上游被水沙运移至此。夹砂红陶片属于战国时代的遗物。综合分析来看,《水经注》蓟县故城当在后期蓟城的上游,也就是说洪水冲毁了蓟城,水沙挟带陶器,破碎成片,砂砾使陶片棱角磨光,流向下游<sup>④</sup>。

早在1957年,赵正之、舒文思发表《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一文,称在广安门外桥南700米处的护城河西岸椿树馆一带的地下土坑中发现战国及战国以前的遗迹,文化层中夹有粗细绳纹陶片、碎绳纹砖、瓦砾、陶鬲腿、陶豆把和饕餮纹的残半瓦当等。饕餮纹半瓦当,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燕宫常用的瓦屋构件,其为战国遗物似无可疑。其他出土的陶

器,经鉴定年代最早的接近西周时代<sup>⑤</sup>。1963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考古》杂志发表一篇简讯《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该文在引用赵正之、舒文思一文的注释中加了编者按:“根据我所的几位同志前往现场观察所得的结论,椿树馆附近发现的饕餮纹瓦当,系出自辽金时代的堆积层中,出瓦当的地方,并无战国时代堆积层。”<sup>[5]</sup>如此看来,1957年椿树馆附近的考古发现结论并不确切,不能以此证明前期蓟城位于此处。在辽金时代堆积层中出现孤零零的饕餮纹瓦当,显然该瓦当来自其他地方,根据赵其昌的研究,很可能是洪水从上游将其冲刷至此的。从蓟城所在的地形条件和漂水的流向来看,蓟县故城应该在东汉以后的蓟城西侧,洪水才能将前期蓟城内的各种残迹搬运至此处。当然,蓟城东侧还有高粱河,但根据岳升阳的研究,古高粱河沉积约在2000—1900aBP已经由河流相逐渐向湖泊相转变,其时代相当于西汉末期到东汉初期,东汉中期什刹海开始成湖<sup>⑥</sup>。据此可知,当时高粱河显然已经不是一条规模很大的河流,蓟城不太可能在东汉末期出现从东边过来的能够将地面冲毁那么强烈的洪水规模,因此前期蓟城位于东汉以后蓟城以东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赵其昌在其设想前期蓟城的第二个位置即北京外城广安门外以西时曾说:“如果设想,燕宫所在的前期蓟城,原在幽州蓟县即后期蓟城之西数里处,而由西来的洪水冲刷,使瓦当等物随水东移数里,息足于后期蓟城内西南侧,这与文献记载倒是两相符合了。同时,后期蓟城之西,数里之内,尚未发现战国、汉代墓葬等抵牾资料。”<sup>[6]</sup>虽然如此,但广安门以西前期蓟县故城区域考古资料缺乏的原因在于北京市从未在后期蓟城以西即广安门外地区做过大规模考古工作,故考古资料较少,因此不能据此判定蓟县故城不会在此处。相反,赵其昌却认为这里最有可能是前期蓟城所在的位置。

### (三)“会城门”地名与《水经注》蓟县故城位置的关系

地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把钥匙,通过有效利用当代地名和历史地名分析、提取地名中隐含的历史地理信息,十分有助于学术研究。金中都城门当中的个别名称就保留了这样的历

史信息。金代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扩建燕京城,改称中都。金中都在原燕京城,也就是后期蓟城的基础上向东、南、西三面扩展,金中都城门一说有十二座,一说有十三座。金中都北城垣有三个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有四个城门,但不管怎样,其中最西边的城门都称作会城门(图1)。金中都在金朝末年遭到战争破坏,会城门附近形成一个村落,叫会城门村,后因城市化而拆迁,今海淀区在原址建有会城门公园。会城门是在中都城扩建以后形成的新城门,原来在燕京城西城垣以外。关于“会城门”一名中的“会城”,有学者关注过其含义,但多望文生义,不理解其真实内涵。“会城”并不是指代金中都,历史上金中都没有“会城”的说法。那么,“会城”指代的是什么呢?这要从地名学的角度来分析,“会城”在地名学上是有其特殊含义的。

会城作为地名,在《水经注》中就已经有了相关记载。《水经注·济水》云:“济水又东北,迤为渊渚,谓之平州。漯沃县侧有平安故城,俗谓之会城,非也。按《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县,侯国也,王莽曰鸿睦也。应劭曰:博昌县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故县也。世尚存平州之名矣。”<sup>[3]138</sup>根据这段文字可知,漯沃县的平安故城“俗谓会城”,是指民间将该古城遗址称作“会城”,本身并不是说该城就叫作会城。从文中的“非也”可知,酈道元认为称作“会城”是错误的,而应叫作平安城,这是由于酈道元没有理解民间对于古城遗址的称谓和古城真实名称之间的关系而导致的误解。另《水经注》中有记载“(野沟水)源导延乡城东北,平地出泉,西北径延乡城北”<sup>[3]369</sup>。延乡城遗址在今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湖滨乡安柴村西约一里与今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交界处,《齐乘》记载说“(延乡城)俗又云会城”<sup>[7]</sup>,今称会城遗址<sup>⑦</sup>。刘铭三、李冠军认为会城遗址与《水经注》平安古城实为一城<sup>⑧</sup>。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水经注》中的“俗谓会城”、《齐乘》中的“俗又云会城”均表明民间自古就有把古城遗址称作“会城”的习俗,今日依然如此。

“会城”是民间对古城遗址的称谓,有时在文字上也写作“回城”或“灰城”,这是用不同汉字记录地名发音的结果。在北京地区、河北廊坊和山东邹城一带,均有称作回城或灰城的村落,且都与古城遗址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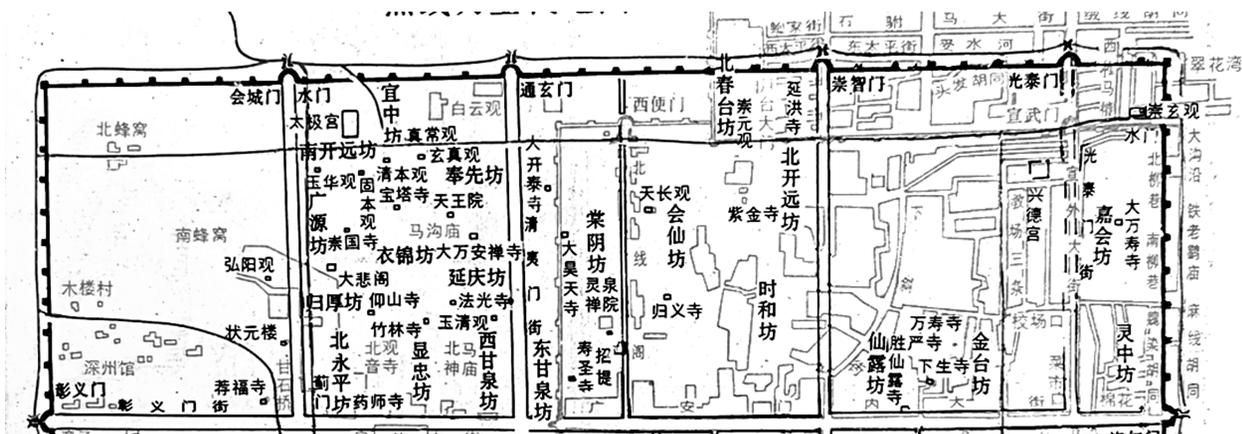


图1 金中都城城门<sup>⑩</sup>

北京市大兴区凤河沿岸有大回城村，村北有东汉回城故城遗址。据《资治通鉴》记载，此城初建于东汉初平四年（193年），为公孙瓒所筑，史书中多称“蓟东南小城”。城内曾出土过铜马具、马骨、尸骨坑，发现过汉代陶井、陶罐等。《旧唐书·地理志》中有“沃州本寄治营州城内，州陷契丹，乃迁于蓟县东南回城，为治所”<sup>[8]</sup>的记载，回城之名延续至今<sup>⑩</sup>。凤河历史上曾为永定河故道，该城很可能毁于早期的洪水。

廊坊地区原有称作“灰城”的村落，曾是历史上的安次县城遗址。安次至少在西汉初已经设县，最初县治（即县城）在今廊坊市西的古县村，延续时间长达820余年。唐武德四年（621年），受永定河洪水影响，安次县治南迁至石梁城，但因此处地势低洼，易遭受水患，贞观八年（634年）县治又不得不向西北迁至常道城（今九州镇北常道村）。安次县自石梁城迁走后，城址废弃，后形成村落，称作灰城<sup>⑪</sup>，《东安乡土地理教科书》记载：“石梁城，《方輿纪要》云在旧州头东南五十里，即今灰城也。”<sup>⑫</sup>该村已于1954年被永定河大水夷平淤没。

在北京市房山区，同样也有一个回城村，据《水经注》记载圣水时说：“东过良乡县南，圣水南流，历县西转，又南径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有防水注之，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而东南流径羊头阜下，俗谓之羊头溪。其水又东南流，至县东入圣水。圣水又南与乐水合，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东南流，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圣水又东径其县故城南，又东径圣聚南，盖借水而怀称也。”<sup>[3]199</sup>北魏良乡县城在今窦店镇

古城，圣水即大石河，北魏时流经古城之东，西折，至回城村西东流，流经回城村南，东至琉璃河燕都遗址，即《水经注》所描述的“圣聚”，圣聚西侧为良乡县故城，据此可知回城村即为良乡县故城遗址所在。

今山东省邹城市有灰城子村，位于沙河之畔，因有一古城遗址而得名，据《邹县金石隘编》记载，清道光年间“县东北数十里有地名虺城”<sup>[9]</sup>。“虺”音 huī，“虺城”即“灰城”。

可见，这几个被称作回城或灰城的村落，基本上都与古城遗址有关，且这些古城多位于河流附近，似乎与洪水破坏有一定的关系。

上述几个案例提到的会城、回城、灰城，其中“会”“回”“灰”皆为同一语音之转音，是用发音相近的不同汉字记录民间对古城遗址的同一称谓。据此分析，金中都城门的来由，当与古城遗址有关。

“会城”地名线索似乎印证了《水经注》蓟县故城位于东汉以后的蓟城西侧不远处的结论。从元英、磨室二宫“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的记载来看，宫殿位于蓟县故城之内，那么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的距离肯定不超过四里，虽然前期蓟城规模大小尚不明确，但前期蓟城和后期蓟城距离很近是一定的，故在后期蓟城之西有古城遗址，民间称作“会城”。金中都扩建，向西、南、东延展三里，扩建后的中都西城墙显然延及前期蓟城遗址，北城墙最西侧城门当与此遗址相遇，因此称作“会城门”。另外，会城门所指代的古城遗址不可能指后期蓟城，因为后期蓟城自西晋至辽代西城垣一直未动，处于

持续利用状态,并不是古城遗址状态,不会有“会城”的说法。类似于“会城门”这种利用古城遗址命名的方式在后世也有案例,如明清时期修建南海子围墙,在有古城遗址的大回城村附近开设大门,称作回城门。

金中都城城门是利用地物命名的,中都城门利用附近地物命名的还有丽泽门。丽泽门位于中都西城垣三门当中最南端,是以门外泉水命名的。明永乐《顺天府志·宛平县·山川》载:“百泉溪,在宛平县西南十里,旧城丽泽关南,平地有泉三十余穴,东南流入大兴县境,通柳河村。”<sup>[10]</sup>《辽金京城考》说:“丽泽关即丽泽门外之关厢,今之水头庄北,地多泉穴,疑即百泉溪,丽泽门当在其东。”<sup>[11]</sup>

### 三、《水经注》蓟县故城位置及其被洪水冲毁的时间

会城门村在白云观以西一里多地,前面依据《括地志》记载,《水经注》蓟县故城距离后期蓟城不超过四里,而金代扩建中都城,向西延展三里,当与前期蓟城遗址相遇,故金中都北城垣西北城门称作会城门。从192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实测《顺直地形图·北京及其附近》的1:50000地图(图2)来看,在会城门村、木须地村(木樨地)以西,蜂窝村至什方院村一线以北,果厂至普惠寺一线以南一带地势较高,是一片台地,北侧和东侧为古金沟河故道。图上可见台地南面地势低洼,有跑马场的标记,这里是古代莲花池,因位于前期蓟城南侧,故《水经注》称其为“燕之旧池”。自清末《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公使住进京城,西式生活习惯也引进北京。西洋人经常举行赛马会,莲花池一带因地势空旷平坦而被征用为赛马场。《管子·乘马第五》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sup>[12]</sup>从古代都城选址的规律来说,这片台地背依西山,前临大河,易守难攻,适合筑城,很可能就是前期蓟城所在。

《水经注·灤水》还有关于蓟丘的记载:“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sup>[3]216</sup>蓟城得名来源于蓟丘,蓟丘最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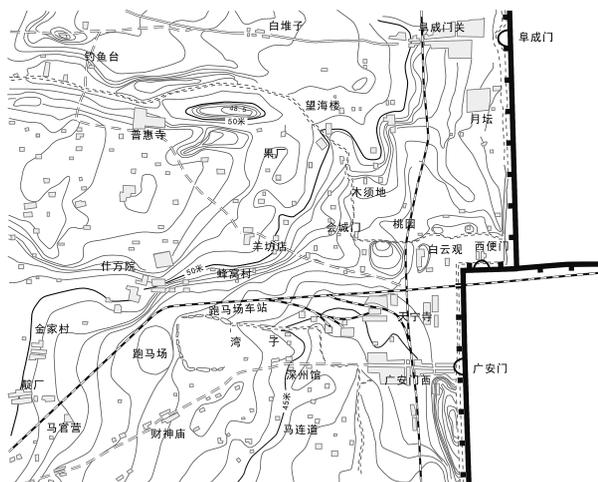


图2 1928年会城门附近地形图<sup>②</sup>

出现于《战国策》,据《战国策·燕策二》记载乐毅报燕昭王书,其中一段提到蓟丘:“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sup>[13]</sup>公元前304年,燕昭王命乐毅伐齐,占领齐国大部领土,将蓟丘上的树木种植于汶水之滨。既然《水经注》蓟县故城在北魏蓟城之西,那么酈道元所说的蓟城内的蓟丘就不是真正的蓟丘。蓟丘很可能是蓟城坐落的丘岗之地,也就是说应该在会城门村以西的土丘一带。刘元章在对北京地铁10号线沿线莲花池区域地层资料进行分析时发现,在莲花桥地铁站以北区域的2米地下明显存在一南北长约365米的基岩凸起,为一孤立的小丘。根据过去1500年内总体沉积厚度分析,推测此丘当时出露地表的高度约为8米,这在平原区应该是一处明显的突出物,因此怀疑其为著名的“蓟丘”<sup>③</sup>。该基岩凸起恰好与会城门以西的台地重合,该台地即是前期蓟城所在的蓟丘。

蓟城故城后来因暴发洪水而被冲毁,其遗址被民间称为会城。《水经》在说到灤水出山之后“过广阳、蓟县北”,按《水经》成书于东汉延熹元年至中平六年之间,这说明当时蓟县故城还未遭受洪水。《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则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sup>[3]216</sup>,此蓟城即后期蓟城,说明前期蓟城已毁(图3)。据曲英杰研究,《魏土地记》当成书于曹魏时期<sup>④</sup>。由此,可以大概确定蓟县故城约毁于东汉末期至曹魏初期这一时间段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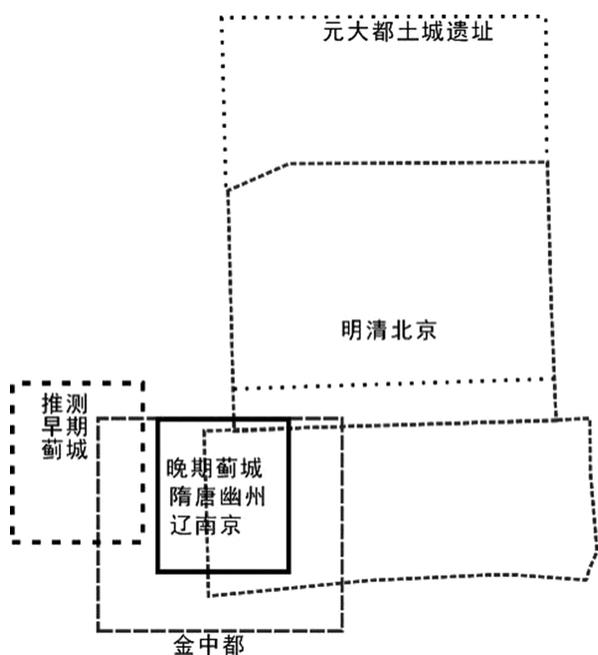


图3 前期蓟城和后期蓟城位置复原示意图

《水经注》中的灤水即今永定河，永定河塑造了北京小平原，为北京城的成长发育提供了基础，但同时永定河也是一条害河，对历史上北京城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尹钧科、吴文涛在《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一书中曾这样评价：“北京地区历史上各种自然灾害以水灾最为严重，而水灾中又以永定河水灾为首，发生频率既高，对北京城的威胁也最大，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sup>[14]</sup>《水经注》中有北京地区最早的有关永定河水灾的记录，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夏六月：“洪水暴出，（车厢渠）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厢，所在漫溢。”<sup>[3]</sup><sup>222</sup>辽金以后，北京成为都城，元明清时期北京长期作为“大一统”王朝都城，而永定河水害愈演愈烈，北京城也始终处于永定河洪灾的威胁之下。《水经注》中关于蓟县故城的记载以及当代考古资料所证实的蓟城城址迁移与灤水洪灾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 结 语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依据酈道元《水经注》原文分析，蓟县故城与北魏蓟城不在一处，按照《水经注》以水为纲记录事物的写作规律，可以判断蓟县故城应位于北魏蓟城

西侧；同时，唐代文献记载燕国宫殿位置的记录也说明前期蓟城在后期蓟城西侧不远处。其次，当代考古发现的西晋蓟城城垣叠压于东汉墓葬之上，说明东汉以后的蓟城相对于早期的蓟城城址发生了位移，并且广安门附近的考古资料证实前期蓟县故城毁于洪水，且出土的燕国时代器物的流水冲刷痕迹和出土地层时代差异也证明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的位置不在一处。再次，我们认为，前期蓟城遗址在地名学上还保留有印记，后世金中都城门会城门的“会城”即来自该故城遗址，也说明《水经注》所记载的蓟县故城位于北魏蓟城即后期蓟城西侧。因此，无论是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还是地名资料，均证实了前期蓟城位于后期蓟城西侧不远处。最后，我们认为，与蓟城形成关系密切的蓟丘应当在今北京西站以北，木樨地以西的高岗地带。并且，根据《水经》和《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的成书时间，大致可以判定前期蓟县故城遭受洪水毁坏大约发生在东汉末和曹魏初期这一时间段内。

## 注释

- ①尹钧科：《北京城市发展史》，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0页。
- ②韩光辉：《蓟聚落起源与蓟城兴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 ③赵国印：《秦汉时期的蓟城》，《文博》1985年第3期。
- ④侯仁之、岳升阳主编：《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
- ⑤刘元章等：《北京莲花池湖的形成时间探讨》，《城市地质》2020年第3期。
- ⑥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 ⑦⑭赵其昌：《蓟城的探索》，载赵其昌：《京华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7页，第23—24页。
- ⑧陶宗震：《燕都蓟城考——兼论北京城的起源》，《北京文博》1996年第1辑。
- ⑨苏天钧：《试论北京古代都邑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34页。
- ⑩陈平：《释“蓟”——从陶文“蓟”论定燕上都蓟城的位置》，《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
- ⑪常征：《〈水经〉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中国水利》1983年第6期。
- ⑫尹钧科主编：《北京建置沿革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 ⑬《光绪顺天府志》认为碣石宫在衙门口村；宁台、元英宫、曆室宫近石景山庞村、北辛安一带。贺次君在《括地志辑校》中认为“四”下脱“十”字，根据宋《太平寰宇记》补上“十”字。一些学者根据《光绪顺天府志》和《括地志辑

校》认为前期蓟城位于《水经注》蓟城西四十里。但贺次君据宋代志书修正唐代志书,逻辑上说不通。<sup>⑮</sup>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sup>⑯</sup>岳升阳等:《古高梁河演变及其与古蓟城的关系》,《古地理学报》2017年第4期。<sup>⑰</sup>舒振标:《东鳞西爪话会城》,载博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博兴文史资料》第5辑,1990年版,第103—108页。<sup>⑱</sup>刘铭三、李冠军:《会城遗址》,载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淄博名胜古迹》,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45—146页。<sup>⑲</sup>资料来源:于杰、于光度:《金中都》附图,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sup>⑳</sup>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地图集》(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sup>㉑</sup>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二十九·地理志九·村镇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16—917页。<sup>㉒</sup>《东安乡土地理教科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第7页。<sup>㉓</sup>据1928年《顺直地形图·北京及其附近》图幅绘制。<sup>㉔</sup>刘元章等:《北京莲花池湖的形成时间探讨》,《城市地质》2020年第3期。<sup>㉕</sup>曲英杰:《燕都蓟城考》,载《京华旧事存真》第三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3344.

- [2]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J].文物,1959(9):6.
- [3]酈道元.合校水经注[M].王先谦,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J].考古,1963(3):169.
- [6]赵其昌.蓟城的探索[M]//京华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6.
- [7]于钦:齐乘校释[M].刘敦愿,宋百川,刘伯勤,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302.
- [8]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24.
- [9]山东省邹城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邹城市志[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669.
- [10]《北京旧志汇刊》编委会.永乐顺天府志[M].王熹,校点.北京:中国书店,2011:202.
- [11]周肇祥.辽金京城考[J].中和月刊,1941(11):6.
- [12]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83.
- [13]战国策[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73.
- [14]尹钧科,吴文涛.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330.

## Study on the Location of the Former City of Jixian in *Shuijingzhu*

Chen Xibo

**Abstract:** According to Li Daoyuan's book *Shuijingzhu*, the former city of Jixian prior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on the west side of Jicheng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palace ruins of Yan State recorded in *Shuijingzhu* was located on about four miles west of You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former Jicheng in *Shuijingzhu* was on the west of Jicheng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ontemporary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have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artifacts unearthed near Guang'an Gate in present-day Beijing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flood deposits carried from west to east. This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location of Jicheng. In the Jin Dynasty, Zhongdu was expanded, with the western wall extended three miles westward. The Huichengmen Gate was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north wall of the Zhongdu city. "Huicheng" is a reference to the ancient city site in toponym, which also proves that there are ruins in the west of Jicheng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place names,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mutually support each other, indicating that the former city of Jixian, as described in *Shuijingzhu* is near to the west of Jixia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at is, Jicheng in the later period. Analysis of modern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dicates that, the former city of Jixian in *Shuijingzhu* is located on a terrace on the west side of Huichengmen village, where it is identified as an ancient site known as Jiqu. The city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destroyed by floods from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Cao Wei Dynasty.

**Key words:** *Shuijingzhu*; the former city of Jixian; location; flood

[责任编辑/启 轩]